

山西大学百年校庆学术丛书

阎锡山与日本关系史研究



SHANXI DAXUE BAINIAN XIAOQING XUESHU CONGSHU

叶昌

著

267

书海出版社

YANXI SHAN

YURIBEN

GUANXISHIYANJIU

山西大学百年校庆学术丛书

阎锡山与日本关系史研究



SHANXIDAXUEBAIANNIANXIAOQINGXUESHUCONGSHU

叶昌纲 \ 著

书海出版社

责编:刘小玲
复审:石凌虚
终审:王灵善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阎锡山与日本关系史研究/叶昌纲著. —太原:书海出版社, 2001. 12

(山西大学百年校庆学术丛书)

ISBN 7-80550-396-6

I. 阎… II. 叶… III. ①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现代②阎锡山(1883~1960)—人物研究
IV. D82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2140 号

山西大学百年校庆学术丛书

阎锡山与日本关系史研究

叶昌纲 著

*

书海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0351-4922102

<http://www.sxep.com.cn> E-mail: sxep@sx.cei.gov.cn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5.375 字数: 2040 千字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

ISBN 7-80550-396-6

G·362 定价: 全套 160.00 元



作者简介

叶昌纲，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人，1937年生。1958年安徽省巢县中学毕业，1963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1966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研究生毕业，现为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主编并出版的主要著作有《近代世界重大问题理论探讨》、《中外学者论张学良、杨虎城和阎锡山》、《世界历史备览》。与人合译并出版的译著有《日俘“残留”山西始末》。此外，还在省级以上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译文十余篇。

总 序

山西大学校长 郭贵春

山西大学百年校庆之际,我们决定出版这套“山西大学百年校庆学术丛书”。

一百年前,在欧风东渐、风雨如晦的清代末年,山西大学作为我国成立最早的三所国立大学之一诞生了。从此,伴随着祖国发展的命运和时代前进的步伐,山西大学不断发展壮大。世纪百年,沧海桑田。如今,山西大学已成为一所文、理、工、管理、艺术、体育专业齐全,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协调发展的,三晋大地惟一所实力雄厚的综合性大学。山西大学以其悠久的历史和百年来的快速发展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每一所学校都有自己的学术传统。自清末张之洞、杨深秀开办“令德堂”书

院,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岑春煊创立山西大学堂,设中斋、西斋,并附设译书院以来,山西大学从创办伊始就一直体现着中西互补、弘扬学术的科学精神。承继山西大学百年传统的优良校风,为神圣的科学教育事业不懈奋斗,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贡献力量,就是我们出版这套丛书的宗旨。

“山西大学百年校庆学术丛书”由社科处组织,将我校近年来科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尤其是中青年学者的人文科学成果集中筛选,辑作丛书,予以出版。我们把她作为一份生日礼物奉献给滋养我们成长的百年母校及所有校友。

愿山西大学在新世纪继往开来,再创辉煌。

2001年3月

前 言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我在大学做日本史研究生时，曾立志专攻日本史，后来分配到山西大学历史系任教之后，深感要在远离首都而当时又比较封闭的省一级的大学里从事作为外国史之一的日本史研究，并非易事。其原因，一是外文资料，尤其是日文原始资料匮乏；二是学术信息欠灵通。有鉴于此，我决定改变研究方向，专攻中日关系史，而首选研究课题则为阎锡山与日本之间的关系史。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是阎日关系史研究对于弄清近代中日关系史和近代中国军阀史大有裨益；二是阎锡山与日本之间的关系“源远流长”，大有用武之地；三是阎锡山是山西人氏，并长期统治山西，他与日本之间的关系的

史料，多存于山西；四是在当年阎锡山政权供职的一些高级军政人员依然健在，可供咨询、访问；五是在解放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由于种种原因，学界对阎日关系史少有问津，故大有探讨和研究之必要。本课题的研究，始于80年代中期，中间曾一度中断，屈指一数，断断续续，已有10余年。拙著《阎锡山与日本关系史研究》，就是在这长达10余年间有关阎日关系史中若干重要问题研究的汇集，也是我在这一领域中研究情况的展示。需要一提的是，拙著最后几篇文章，内容虽与全书主旨不甚相近，但亦属中日关系史研究的范畴之内，因此，就宏观而言，也并非全无关联，故附录于后。这些专题研究成果，有些已经发表，有些未及发表。把这些研究成果汇集在一起，出版一本有关阎日关系史研究的专门著作，可以说是我的一个夙愿，但由于较长时间以来在我国形成的出书难，尤其是出版学术著作难的现状，常使囊中羞涩的我，望而却步，哪敢问津。然而，令人惊喜的是，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山西大学百年校庆，山西大学社会科学处独具匠心地决定资助出版一套《山西大学百年校庆学术丛书》，从而为拙著的出版提供了百年一遇的机运。拙著的出版，既使我了却了一桩心愿，也使我这个在山西大学从教多年的教师，能为山西大学百年华诞奉上一份虽属微薄，但却倾注心血的贺礼，真可谓是一举两得，喜上加喜。为此，在这里我谨向山西大学社会科学处表示由衷地感谢。

叶昌纲

2001年2月8日于山西大学

目 录

总序	郭贵春 (1)
前言	(1)
略论阎锡山的《军国主义谭》	(1)
20 世纪 30 年代前半期阎锡山对日本侵华的态度	(17)
略谈阎锡山的“守土抗战”	(45)
抗战时期阎锡山私通日本的历史考察	(61)
关于《汾阳协定》履行问题的历史考察	(76)
阎锡山的日本观	(93)
阎军暂编独立第十总队的历史考察	(107)
城野宏在战后山西活动的历史考察	(123)
河本大作在山西活动始末	(142)
战后日军“残留”山西始末	(163)
战后日军“残留”山西与日本官方的关系	(181)
战后“残留”山西日军人数小考	(198)
战后“残留”山西日军骨干分子简介	(206)
侵华日军在山西暴行综述	(229)
侵华日军在山西放毒投毒大事记	(243)
中日甲午战争与英国	(257)

不可饶恕的日本侵华罪行·····	(275)
1976 年—1986 年间在我国日本侵华史研究概观 ·····	(288)
新中国成立 40 年来我国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述评 ·····	(301)
王辑五与中日关系史研究·····	(316)
 附：作者译文目录·····	 (325)
后记·····	(327)

略论阎锡山的 《军国主义谭》

——兼与张全盛等同志商榷

《军国主义谭》是辛亥革命后阎锡山专谈治国之道的著作。这部约两万言的著作，旨在鼓吹我国推行军国主义的必要性和如何推行军国主义两大问题。近年来，张全盛等同志曾撰文对这部著作进行过论述，但笔者读后觉得言犹未尽，且有疑点若干，因此也想就这部著作问世的历史背景，及其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崇拜和赞赏，对阎锡山军事独裁统治的影响等问题，略加探讨，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军国主义谭》 问世的历史背景

武昌起义爆发不久的 1912 年 2 月 15 日，袁世凯就不择手段地窃取了中华民国临

时大总统的职位。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宣誓就任正式大总统时，又迫不及待地宣称要为集权专制而“修明法度，整饬纪纲”^①。正是在此思想指导下，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正式发布命令，解散国会。同年5月1日，袁世凯又废弃了《临时约法》，从而彻底消除了辛亥革命后仅存的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形式，建立起专制独裁统治。

袁世凯在篡夺辛亥革命果实、攫取国家政权之后，即开始加紧推进帝制复辟活动。1914年2月，他开始举行县知事考试，恢复封建时代的考试制度。3月，他制订并公布了所谓《覲见条例》，恢复了封建皇帝的“陛见”制度。7月，他恢复了封建时代的各种官制，将辛亥革命以来各省的都督改称为“将军”，在北京设立“将军府”，由段祺瑞主管；同时，他将各省民政长改称为“巡按使”，将各地区观察使改称为“道尹”。他还公布《文官官秩令》，把文官分为卿、大夫、士（每个等级又分为上、中、下三等）九等，甚至连总统府的秘书亦改称为“内史”，等等。

袁世凯把这一切安排就绪后，便紧锣密鼓地上演帝制复辟的丑剧。1915年8月，首先由袁世凯的政治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发表一篇题为《共和与君主论》的奇文，作为袁氏帝制复辟丑剧的开场锣鼓。在该文中，古德诺歪曲历史，借古讽今，恶毒诬蔑中国“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以前，由专制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之结果也”。他还胡说：“中国百姓，习于君主，鲜有知大总统者，故君主恒为人所尊敬。”他的结论是：“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这是惟一的出路，否则“断无善果”^②。紧接着，又由袁世凯的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抛出了《共和宪法持久策》一文，恶毒诬蔑中国人不适合共和政体，鼓吹君主实较民主为优，中国必须像日本那样实行君主制，集权力于袁世凯一身，国家才不会

分裂等谬论。袁世凯把这些公开策划恢复帝制的谬论视为至宝，不惜重金买下当年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的一个版面，专供这两个吹鼓手大放厥词、大造帝制复辟的反动舆论。

与此同时，袁世凯的御用爪牙也如蝇逐臭，鼓噪而起。1915年8月，在袁世凯的授意下，为袁世凯所收买的政客杨度、老君主立宪派严复和原同盟会会员孙毓筠、胡瑛、李燮和、刘师培等人，组成所谓“筹安会”（后改名为“宪政协进会”），假借研究学术为名，公开宣传、策划帝制复辟。他们在“筹安会”成立宣言中，对古德诺所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的复辟舆论大加赞扬，吹嘘古德诺是“大政治学者”，他对中国应该实行君主制的主张，是“以共和国民而论共和政治之得失，自为深切明著”；大肆诬蔑共和国体不适合中国“国情”，悍然宣称“中国则尤不能不用君主政体”，如果“长此不图，祸将无已”^③。“筹安会”还打着儒家所谓“拨乱世反诸正”的幌子，提出立国之道不外二端，首先是“拨乱”，其次是“求治”。妄称共和制度不能求治，反而滋乱。提出中国“拨乱之法，莫如废民主而立君主。求治之法，莫如废民主专制而行君主立宪”^④。1915年9月1日，“筹安会”还拉拢各省旅京人士拼凑了各省“公民请愿团”，向参议院请愿，要求“变更国体”，由袁世凯大总统登极做皇帝。

也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善于投机钻营，并在辛亥革命中窃取山西军政大权的阎锡山，为巴结和讨好袁世凯，想方设法地向袁表示效忠，劝袁实行帝制。例如，当“筹安会”在各省掀起所谓请愿运动，要求参议院“变更国体”，由袁世凯做皇帝时，阎锡山不仅在山西如法炮制，争先请愿，同时还指使山西商务总会、山西蔚丰厚票号等，假借山西公民等名义分电请愿，要求参议院早废共和，而立君主。1915年8月25日，阎锡山致“筹安会”电声称：“贵会讨论国家安危根本问题，卓识伟论，无任纫佩。

已遵嘱派遣代表崔廷献、南桂馨赴会讨论，乞赐接洽，时盼教言。”^⑤同年9月3日，阎锡山又致电袁世凯，内称：“窃维军国主义，自欧战剧烈，益为列强趋势所注重，而军国主义必借帝国主义以推行，共和政体，绝不适于生存，此持国家主义者之公论。锡山前密呈实行军国主义，已邀睿鉴。近自筹安会讨论君主国体问题，全国一致，极表赞同，公民请愿，望治甚殷。诚以中国之情，绝不宜沿用共和制度，非采取德日两国君主立宪法，不足以立国而救亡”、“当辛亥革命之初，尝以共和为新旧递嬗时代之权宜手续，四年以来，默察国情，征诸经验，乃确信共和之不足以安中国”^⑥；同年9月16日，阎锡山又致电参政院称：“吾国苟不足自立，将为东西不和平之导线。自立之道，非厉行军国主义，不足以图强。欲厉行军国主义，非先定君主立宪，断不能收上下一致精神贯彻之效。富强如英，经数次战争，犹深感畴昔自由主义之困难，而趋向于军国政策。我以积弱之国，急起直追，惟日不足，如果能与列强势力相剂，而趋于相等，则国际和平之维持，乃有确实之保证，非厉行军国主义，果有何术以致之。而以共和总统制，厉行军国主义，与以君主立宪制，厉行军国主义，试以德法英美各先进国为比例，果熟得而熟失？盖共和之精神，与军国民之精神，固已绝不相容，而德日之发奋为难，岂非以君主立宪而厉行军国主义之效！”^⑦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指使其秘书将他在日本留学时期的笔记整理成书，广为印发。这就是他的《军国主义谭》一书。在这部著作中，阎锡山根据德、日两国尤其是日本实行军国主义的经验，进一步强调在中国实行军国主义的必要性，并指出要实行军国主义，又必须实行君主立宪制。由此可见，《军国主义谭》一书是阎锡山为给袁世凯复辟帝制造舆论的产物，同时也是阎锡山效忠袁世凯并积极劝进的铁证。正因为如此，袁世凯称帝后，不仅袒护和支持阎锡山

在山西的军事独裁统治，而且封阎锡山为一等侯。^⑧

二、《军国主义谭》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崇拜与赞赏

阎锡山于1904年7月东渡日本留学，先入东京振武学校学习，1906年—1907年入日军弘前步兵第31标实习。实习结束后，正式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1909年3月，毕业回国。阎锡山在日本留学时，正值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军阀竭尽全力同沙俄争夺对中国东北的霸权，大肆鼓吹所谓“大日本”军国主义，竟以小而比较落后的国家打败了庞然大物的沙俄。这使阎锡山大为倾倒。在他看来，当时日本之所以能够战胜沙俄，是因为日本厉行军国主义。因此，阎锡山对日本采用军国主义的治国之道，大为褒赏，极力称赞。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小且贫难于强，苟得其道，则日本可以崛起。大且富易于强，苟失其道，则印度夷为隶属。盖大小贫富半属于原质之生成，而强弱则纯关于政治之作用”^⑨。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阎锡山远在日本留学时期，就非常留意搜集日本社会中与军事相关的资料，企图在适当时候利用这些资料写成一书，在中国予以介绍，以便国人效法日本，弘扬军国主义。对此，阎锡山在所著《军国主义谭》一书的序言中亦曾写道：“曩余留学东瀛时，正日俄战争胜报日数，至街衢老幼男女欢欣舞跃，有若狂然。其人民爱国情形以吾国人见之健羨之下有余悲焉。尝欲研究其强盛之由，著一书以饷祖国，进而考其政教风俗，凡社会所表现，报纸所记载，随在皆含有军事意味，纯然军国主义之国也。桓桓军人乃其缩影耳，因不辞琐碎凡零闻片语与军事精神息息相关者，辄录存之，久而渐积成册，惟片段错落未经编次成篇，聊当笔记存之，藉备遗忘而已。己酉返国忝膺军职，公余之暇，兼考德意志军国政略参互印证，三年夏间出稿以授诸书记官崔君文征，因设为问答整理成

帙，义取达旨非敢云文，故有义为文掩者，则宁削文以伸义，稿几数易始克付印”^⑩。由此可见，《军国主义谭》也是阎锡山对军国主义，尤其是对日本军国主义极为崇拜的思想指导下写成的一部著作。因此，这部著作充满着对日本军国主义崇拜和赞赏之情，可以说它是阎锡山崇拜军国主义，尤其是崇拜日本军国主义的自供状。具体而言，阎锡山在《军国主义谭》一书中，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崇拜和赞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 对日本军国主义尚武精神的崇拜和赞赏。关于这一点，阎锡山在《军国主义谭》一书中曾说：“明治十年，西南之乱，将士伤亡送病院者，皇后太子妃亲制绵缣丝赐之。天皇临大阪病院，亲问赐物，对于其伤者尊重为何如乎！……日本军人出征，必先摄影，战死则悬之国光馆。其靖国神社招魂大祭时，不仅天皇主祭，并太子妃亦为军人遗族之招待妇。日俄战后，国人渐有厌兵之感，政府因令军人星期不假，免于社会交通，天皇思念阵亡将卒，夜不成寐，明降谕旨，收集阵亡相片，悬挂卧室，其尊重死者为何如乎！要之，尊重军人，即尊重国魂也。”^⑪在该书中，阎对日本民间因受军国主义尚武思想毒害而采取的某些做法，也是喋喋不休，大加赞赏。如说，在日本“商号售货，军人减价；火车座位，军人优先；市场之丝布竹木金漆各物品，仿造军人之像，光彩夺目；凡公园戏院，各名胜游览之所皆减卷价；出征用品特别贱售；在平日入伍退伍，尚见到处欢送欢迎，一遇战事祝捷奏凯，更视为无上之荣。家有从军者，其门楣以木板标‘出征军人’四字，邻里戚邻，争为光宠，凡此之类，不胜罄述”^⑫。不仅如此，阎锡山对日本社会为鼓动民间和军人的“武勇”精神而进行的种种宣传和煽动，甚至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将其在甲午战争中“割台湾，陷旅顺，大破辽阳，占领奉天”等侵华行径视为“光荣”而大加宣传等卑鄙行为，也赞不绝口，予以褒

扬。

(2) 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教育和训练方法的崇拜和赞赏。阎锡山在《军国主义谭》一书中，曾多次强调军国主义教育在军国主义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基于这种认识，他在该书中，对日本军国主义者把甲午战后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当做耻辱，把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视为国光写进其中小学教科书一事称颂不已。说什么“日于未与俄战十年以前，早已将俄人横暴凌侮，侵略东亚之情形，列为教科，虽盲哑学生，言及俄人无不愤恨。方甲午归还辽东，受俄德法所挟制，因于中小学校中，昌言申教，以激励生徒之脑。至后满洲撤兵迁延之时，其国中青年会，激昂慷慨，欲决一战。当德之败法也，德相归功于小学校。日之胜俄，其国中舆论，亦有斯说，信不虚也”^⑩。与此同时，阎锡山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僧侣对士兵进行军国主义教育一事，也是颇感兴趣，大为赞许。他在该书中写道：“昔日本在明治五年，试行征兵令时，将神官寺僧，俱受（授）教导职，属于文部省，约法三章，以爱国为主……尤要在能将军官对于兵丁所不能言之道理，藉宗教家以感化之。例如，德人呼队官曰队父，呼下士曰队母。日本兵呼官长曰神使，此等特别敬奉官长之心理，均官长所未便自出诸口者，有军僧以补助之，实为教育上之妙用。”^⑪不仅如此，阎锡山对日本军国主义者为养成士兵的所谓“最后十五分钟”的精神而采取的惨无人道的训练方法，也很青睐。他在《军国主义谭》一书中，不无夸张地说：“尝见夫日本军队之培植此最后十五分钟也，其练冻也，而一营全数僵死于野者有之；其练热也，而成灼疮者有之；其练跑也，至大多数绝倒于地者有之；其练饥也，至一昼夜之操练而不暇饮食者有之；其他因地因时之训练，均必至人所不能忍受之时而后已。……彼国近年教练，每至疲劳困乏之不胜，有自断其指者，有卧于铁轨之中为火车压死